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的文學思想
—歷史敘述、敘解模式及其自我重構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4-138-MY3

執行期間：2008年8月1日至2011年7月3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

計畫主持人：曾守正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黃惠萍、楊雅筑、張柏恩、林綏傑、邱怡瑄、曾令愉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須繳交以下出國心得報告：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28 日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的文學思想

—歷史敘述、敘解模式及其自我重構

研究成果報告*

一、研究背景

(一)《四庫全書總目》研究應有擴大方向之必要

1. 擴大補正訂誤、目錄版本以外的研究路向

周積明曾指出：《四庫全書總目》¹自十八世紀下半葉完成以來，即得王昶、周中孚、繆荃孫、余嘉錫、張之洞等人的推崇，但這也有值得反省之處²：「如上所論，雖然無不高度評價《總目》的價值，但皆局限於從目錄學立論，即僅僅把《總目》看作一部體制完善、編制出色的大目錄書。……研究者也從刊誤、補正、考核、糾謬上下功夫。……但是，僅僅從目錄學的角度看待、研究《總目》，畢竟視野太狹窄。包容廣闊意蘊豐富的《總目》，決非『簿錄之書』或『目錄學著作』之名可以加以範圍。」周氏曾藉用法國文化史家丹納(Hippolyto Adolphe Taine)的說法，認為《總目》「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產品、一種客觀化的精神，因而必蘊含著鮮明的價值取向和特定的學術文化觀念」³換言之，在既有目錄學、文獻學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探究《總目》的學術文化觀念及其價值取向，應能開拓《四庫》學，乃至乾嘉學術的深度與廣度。

據陳曉華的觀察，大陸自1980年以降，《總目》研究成果已站在傳統補正訂誤、目錄版本的基礎上，展開《總目》經世價值取向、文化價值重估、經學觀、文風觀，乃至研究方法的重新探討，其中黃愛平、張新民、葉文青、季野、吳承學、王記錄等學者，斐然有成。⁴於是，《總目》可被視為一種反映學術思想的文本，研究者有重建其特定價值取向、文化觀念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2. 應擴大研究路向的理論基礎

《總目》應擴大研究路向的呼籲，約已持續二十年了。至於其應擴大的理由，我們可從「『歷史理解』的性質」與「『提要』的引導性質」兩方面，予以掌握。

(1)『歷史理解』的性質

*【本計畫係為多年期，原計畫書在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上，未做年度區分，茲為求報告完整，故保留第1、2年期中報告上述諸項內容；又上述內容多為過去研究成果的承續，故有相同之處，特予說明。】

¹《四庫全書總目》常或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要》等名，據大陸學者崔章富考證，自乾隆時期以降的二十四種版本，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名者，僅出現於二十世紀前期的二十餘年間；至於《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內容或有出入，故仍應稱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乃《總目》修改定稿之前形成的，而「獨立在《總目》之外存在的許多〈提要〉傳本，相互之間差異甚大。如《四庫全書薈要》所載〈提要〉四百六十三篇，跟文淵閣所載比較，不同者二百八十篇，微有不同者四十六篇，合計三百二十六篇，達十分之七以上。」〈提要〉傳本已各自不同，其又與「《四庫全書總目》確實不是一回事。」見氏著：〈二十世紀四庫學研究之誤區——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例〉，《書目季刊》，第三十六卷第一期，2002.6。本文採崔氏說法，並於後文一律省稱為《總目》。

²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文化價值重估〉，《書目季刊》，第三十一卷第一期，1997.6。

³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與十八世紀中國文化的流向〉，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9)，頁56。

⁴陳曉華：〈四庫總目學研究述略〉，《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4期，2006.7，頁138-144。這類總結觀察的論文，約略見解相同，可另參周積明：〈四庫學通論〉，收入氏著：《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10)，頁265-293；李杰：〈90年代《四庫總目》研就論文綜述〉，《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01年第3期；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述略〉，《圖書館雜誌》2002年第6期。

首先，我們若運用西方詮釋學的觀念來看，「歷史理解」乃作為過去和現在的中介，⁵文本在歷史學家看來，是一種材料，一種做為可掌握意義的泉源；歷史學家通過具體情況去理解文本的內容，並以整體的自我知識決定事件之歷史意義。文本在時間性上，是「過去」的；歷史理解在時間性裏，卻是從「現在」通往「過去」，並由「過去」返回「現在」的。首出的「現在」與再出的「現在」，最大的差異，是後者產生並賦予新的歷史意義。換言之，《四庫》館臣面對歷史文本（即四部諸圖書），通過具體文字表述其「歷史理解」（即《總目》對諸圖書之述評），而「歷史理解」的「現在」性，即帶入「客觀化的精神」。所以，我們可就其「歷史理解」的內容、過程，做一重新反省，以掌握其賦予新意義的所在。舉例來說，大多學者同意《總目》的學術傾向，基本上支持漢學而貶抑宋學的。但夏長樸先生從《總目》〈提要〉與《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進行研究，發現纂修四庫的原始目的在於關注宋學，但最後卻成為批判宋學而標榜漢學⁶，這種發現與觀察，無疑將《總目》的學術傾向予以「歷程化」。此「歷程化」乃相對於「固定化」而言，即我們通常從《總目》的文本論述，歸納整理其學術傾向，但其傾向是經過怎樣的變化而形成？又變化的理由何在？由某傾向轉成某傾向的內在邏輯、外在條件為何？都是值得我們去思想的問題。換言之，館臣「歷史理解」的「現在」性，是值得我們重新去思考、研究的課題。

吳光明曾說：「中國是一個具有豐富的歷史與歷史意識的文化，這項事實說明了，中國文化的『自我瞭解』，是透過具有歷史意識的自我詮釋而進行的。」⁷至於「自我瞭解」的活動與目的為：「中國人在歷史的過程中，進行『自我詮釋』而將中國的社會結構內在化，而成為中國人共同的心理結構。『自我詮釋』正是透過歷史性的思考來進行的。」「瞭解一個生命就是解釋他的『自我』，由此瞭解而解釋存在，我們回溯以往而領悟了這層道理，這種歷史性的瞭解是存在本身的自我顯示——通過人的存在，而這人的存在等於他的『自我解釋』」⁸因此，我們可以說：《總目》面對的述評對象，正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文本；而述評本身就是「自我瞭解」的成果。所以，當館臣將心力投向外在的歷史文本時，他們同時也正進行內在的「自我詮釋」與「自我瞭解」，經過反思後的文化內容，將會反饋並成為自我心理結構的一部分。我們不妨進一步借用美國史學家卡爾·休斯克（Cril E. Schorske）的說法，將這種行為視為「自我重構」（Self-reconstruction）的動作⁹，而《總目》的主觀性質就在歷史理解與自我重構的間架中，逐步衍化、產生。

（2）『提要』的導引性質

因為《總目》具有目錄的性質，再加上館臣強調以考據態度撰作〈提要〉，所以我們容易忽略論述底層的主觀性。《總目》〈凡例〉第九條¹⁰云：

今於所列諸書，各撰為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為《總目》。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瘡，用著勸懲。其體例悉承聖斷，亦古來之所未有也。

⁵ 貝蒂：〈作為精神科學一般方法論的詮釋學〉，收入阿斯特、施萊爾馬赫、狄泰爾、海德格等著，洪漢鼎等譯：《詮釋學經典文選（上）》，（臺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2002.6），頁159-161。

⁶ 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23卷2期，2005年冬季號，頁83-128。

⁷ 吳光明：《歷史與思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9），頁123。

⁸ 吳光明：《歷史與思考》，頁122-123。

⁹ 卡爾·休斯克此處的說法，雖是針對20世紀現代主義與古代傳統關係的說明，故所謂的「自我重構」亦具有「歷史變遷不僅僅逼迫個人去探討新的身份，同時也要求整個社會群體，能夠擔起對垂死的信仰體系進行修正與替代的重任」的意義，本文並不以「現代主義」與「傳統」的對列關係進行比附，而僅就歷史論述具有某程度「自我重構」而言。見卡爾·休斯克著、李鋒譯：《世紀末的維也納》，（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5），〈導言〉，頁1-2。

¹⁰ 【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2），卷首三「凡例」，頁1（冊）-36-37。本文四庫全書版本全據文淵閣本，後不贅述，並省稱為《總目》。

提要體例來自「聖斷」，這帶有強烈官方權威的意味，下貫於實際書寫時，包含了作者的「論世知人」，書籍的「訂辨」，以及個人表現（「人品學術」）、群體表現（「國紀朝章」）的詮釋與評價。在館臣的觀念裏，歷史理解可以通過考究（「考本書之得失」）、權說（「權眾說之異同」）等步驟與工夫，獲得歷史圖像，且此圖像具有客觀性、正確性。可是，「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瘴，用著勸懲。」的說法，又何嘗不意指：我們對歷史圖像的思辨與解釋，終究是一種價值指向的解釋。「各昭彰瘴」的彰善瘴惡、勸善懲惡，就在通過具體歷史人物與著作的理解與建構中，逐步落實、完成。而理解與思辨的文本材料是個別的人物與著作，但個體生命終要還入群體生命之中，重新受到考量，乃至評價，故「論世知人」說明了館臣將文本材料往兩個向度延伸——個體的與群體的。所以，在建構歷史圖像的同時，「人品學術之醇疵」可受評價，「國紀朝章之法戒」亦需重視。上述種種努力，在「悉承聖斷」的氣氛下，政治權力瀰漫於思辨、解釋、評價歷史圖像中，完成「庶幾公道大彰，俾尚論者知所勸戒」的目標。總之，一旦涉及「善、惡」的區判與批評，價值標準勢必成立，其主觀性終不可掩飾。

周彥文曾以明代文學為例，指出《總目》將萬曆以後的文學，進行了負面的評價，並且「很明顯的貶抑明末的文學，並大力提高清初文學的振興局面，給後人一種聖朝臨治，文教大興的印象」並據此稱《總目》為一種「導引性」的提要¹¹。「導引性」即表現出一分主觀的態度與企圖。當然，館臣是否是單純地抑明末文學以烘托清初文學之振興，而毫無文學藝術之內部考量？尚待我們進一步檢討，但是〈提要〉可能的主觀性，終是值得正視的現象。

總之，近二十年來《四庫》學研究，雖已有數位學者別出考證路數，自文學角度研究《總目》，也頗有佳績，然就集部各類做相對封閉性的探討尚少，更未曾重建《四庫》館臣所構築的文學思想史圖像，並探討圖像形成的底蘊。所以，本人承蒙國科會九十五年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展開「《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考察「公論」下的文學批評史圖像」的研究。在研究中，將「詩文評類」的〈提要〉視為「文學批評」的文本；而《總目》對前代批評著作的述評，又視為「歷史理解」的內容。因此，《四庫》館臣通過怎樣的歷史觀點與美學標準來表述文學批評的概念、建構文學批評史的圖像等，就成為該計畫所欲探討的學術議題。但在研究「詩文評類」的過程中，發現館臣在考證以外的評價與詮釋之語詞，往往簡短而片斷，若要勾合《總目》整體的文學思想，勢必然得擴及他類〈提要〉，故九十六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為「《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的文學思想——考察『選本評』的再批評意識」乃以集部「總集類」為研究對象，將「總集」視為「選本批評」，擴大研究範圍¹²。事實上，館臣的批評史論述與文學史是相即的，故此次三年期計畫擬將視野轉向「別集類」，並綜合批評史、文學史論述（全文簡稱為「歷史敘述」）為觀察重點。

（二）「文學思想史」¹³研究應有填補隙縫之必要

1. 《總目》與文學研究

朱東潤曾說：「曉嵐論析詩文源流正偽，語極精，今見於《四庫全書提要》，自古論者對於批評用力之勤，蓋無過於紀氏者」¹⁴朱自清亦指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各條，從一方面看，也不失為

¹¹ 請參見氏著：〈論提要的客觀性、主觀性與導引性〉，《書目季刊》，第三十九第三期，2005.12，頁34-37。

¹² 目前已完成〈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學思想〉，《書目季刊》，第四十一卷第二期，2007.09。

¹³ 「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內涵，因涉及文學創作層次所反映的思想，故較「文學理論史」「文學批評史」廣泛，且能包含這兩個學科。而《總目》所牽涉的範圍，實不限於「文學理論史」或「文學批評史」一端，其亦涉及館臣對文學創作活動、作品之掌握，故此處以「文學思想史」稱之。此外，《總目》〈提要〉也多見館臣所建構的「文學史」圖像，而我們可從中掌握圖像底層的核心觀念，此亦屬「文學思想史」的研究範圍。關於「文學思想史」的研究範圍，參見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引言〉，《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頁1-12；羅宗強：〈我與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因緣集——羅宗強自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10），頁1-11。

¹⁴ 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開明書店，1979），頁354；敏澤：《中國文學思想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4），〈序〉，頁1-13。

系統的文學批評」¹⁵，這二人都已從文學批評（史）的角度來肯定《總目》價值，只是這些聲音尚為微弱，且未展現「歷史理解」的內容與過程。在現存文學思想（或批評）史中，少有專節討論《總目》的內容。事實上，《總目》除了有批評方法、批評內容、亦有批評史的論述。這方面最集中的實踐，應表現在「詩文評類」上。可是，〈提要〉原是目錄版本學的產品，所以館臣的許多見解，往往通過「注解」型態簡潔地詮釋；其中或有「判斷」型態的批評，卻因〈提要〉書寫的成規，顯得僅具「聲明性」，缺乏深刻地舉證、詮釋與推論。¹⁶況且，在乾嘉的學術氣氛中，「注解」與「判斷」經常落於語言或史事的考據上，對於文學見解的表述就顯得相對薄弱、間接。因此，若要研究《總目》的文學思想，可以「詩文評類」〈提要〉為出發，但集部的其他類目提要，亦值得關注，尤其是「總集類」。

「總集」本身即為另一形式之批評著作，實可視為「詩文評」著作的一種表現¹⁷。楊松年自年一九八一年發表〈詩選之詩論價值：文學評論研究之另一方向〉¹⁸開始，即致力研究選集中所反映的文學批評思想，其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問題研究論集》¹⁹，則兼從理論層次與實踐層次，反省、與建構中國文學批評史。楊氏曾引王瑤的說法：「中國人一向不太注重詩文評，他們對詩的意見常寓於總集的選彙中。因此，一部《文選》之影響中國詩人文人，是遠遠超過任何一部詩文評之作」²⁰換言之，總集被視為一種具有文學批評意義的表述形式，其中充滿選編者的文學意識。近十年來，學者們將這種文學批評的形式，稱為「選本批評」，並逐漸視為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重要現象之一²¹。張伯偉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²²一書中，即將「選本」視為一種批評方法，並討論其方法的形成、發展與影響。鄒雲湖《中國選本批評》²³一書，則論述中國選本批評的變遷及其原理。香港陳國球據《唐音》、《唐詩品匯》、《唐詩正聲》、《古今詩刪》等「揭示唐詩在明代受承納的情況，以及復古派詩論的相關發展。」²⁴，直至近日出版查清華《明代唐詩接受史》²⁵亦以明代唐詩選編做為接受史討論的核心現象。「選本批評」乃指選編者藉由選擇編纂的活動，展現一種汰刪或保存的主動批評意識與行為。在中國目錄學的分類上，從《隋書·經籍志》到《四庫全書》，「選本」大都被歸於「集部」的「總集類」中。因此，若能通過《四庫全書總目》的〈提要〉，釐清館臣如何面對這些選本及其選編意識？館臣對於選本的詮釋與評價，又展現怎樣的文學思想？這些都應能豐富選本批評與《四庫全書總目》兩方面的研究內容。

我曾通過「詩文評類」、「總集類」〈提要〉的批評史圖像，探討圖像背後的文學思想。當然，我們還可以從「別集類」的實際批評意義與「文學史」的角度，掘發館臣的文學思想，因為：第一、若「集部」的概念是類似今日「文集」的概念，那「別集」的〈提要〉應具有某種文學實際批評的意義；第

¹⁵ 朱自清：〈詩文評的發展〉，收入氏著：《朱自清全集》第三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3），頁27。

¹⁶ 請參見孫紀文：〈《四庫全書總目》對歷代詩歌的批評〉，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5年05期，頁81~86。

¹⁷ 當然，也有學者持不同的觀念，如王慶梅就認為「總集」不等於「選集」，其不全然為一種文學批評的表現。見氏著：〈文章之衡鑒 著作之淵藪——總集探析〉，《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04期，頁115~120。唯在〈總集類序〉中，仍可看出批評之義，請詳見下文討論。

¹⁸ 楊松年：〈詩選之詩論價值：文學評論研究之另一方向〉，《中外文學》第10卷第5期，1981.10。

¹⁹ 楊松年：《中國文學批評問題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5），至於理論層次之討論者有〈選集的文學評論價值：兼評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寫作〉；實踐層次的討論者有〈王夫之評選唐代詩人與詩作：《唐詩評選》研究〉、〈王夫之評選唐代詩人與詩作：《明詩評選》研究〉、〈王夫之《明詩評選》與錢謙益《列朝詩集》的比較研究〉等。

²⁰ 同上註，頁56。

²¹ 樊寶英特別指出楊松年、張伯偉、鄒雲湖為近年來給與予此論題較多研究者。當然，在這幾位的著作中，亦提及鄭振鐸、魯迅、方孝岳、朱自清、朱東潤等人乃為先行者，本計畫暫不做一一考索。樊氏：〈選本批評與古人的文學史觀念〉，《文學評論》，2005年2期。另黃念然：〈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研究的現狀與反思〉一文，則對方孝岳、王瑤與朱自清的看法，有了更進一步的闡述。（中國大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九五』重點課題『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收入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網址 <http://www.xxjbc.com.cn/LibraryView.asp?LibraryID=262>）

²² 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1），頁227-325。

²³ 鄒雲湖：《中國選本批評》，（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7）

²⁴ 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頁50。

²⁵ 查清華：《明代唐詩接受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

二、在館臣的實際批評中，其批評對象——「詩文評類」、「總集類」都具有文學批評文本的質性，所以館臣的實際批評為一種「文學批評的再批評」，而館臣對於「別集類」的批評，則為「文學作品的批評」，此為第一序的實際批評；第三、我們在以批評史角度觀察館臣的文學思想時，不難發現館臣建構的批評史圖像，往往與文學史圖像相伴，如〈明詩綜提要〉²⁶云：

國朝朱彝尊編。……明之詩派，始終三變。洪武開國之初，人心渾朴，一洗元季之綺靡。作者各抒所長，無門戶異同之見。永樂以迄宏治，沿三楊臺閣之體，務以春容和雅，歌詠太平，其弊也冗沓膚廓，萬喙一音，形模徒具，興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慶之間，李夢陽、何景明等崛起於前，李攀龍、王世貞等奮發於後，以復古之說，遞相唱和，導天下無讀唐以後書。天下響應，文體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奪長沙之壇坫。漸久而摹擬剽竊，百弊俱生，厭故趨新，別開蹊徑。萬歷以後，公安倡纖詭之音，竟陵標幽冷之趣，么弦側調，嘈囀爭鳴。佻巧蕩乎人心，哀思關乎國運，而明社亦於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遞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諸家選本，亦遂皆堅持畛域，各尊所聞。至錢謙益《列朝詩集》出，以記醜言偽之才，濟以黨同伐異之見，逞其恩怨，顛倒是非，黑白混淆，無復公論。彝尊因衆情之弗協，乃編纂此書，以糾其謬。每人皆畧敘始末，不橫牽他事，巧肆譏彈。里貫之下，各備載諸家評論，而以所作《靜志居詩話》分附於後。雖隆、萬以後，所收未免稍繁，然世遠者篇章易佚，時近者部帙多存，當亦隨所見聞，不盡出於標榜。其所評品，亦頗持平。於舊人私憎私愛之談，往往多所匡正。六、七十年以來，謙益之書久已漸滅無遺，而彝尊此編獨為詩家所傳誦。亦人心彝秉之公，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館臣使用大量文字，先鋪述明代的文學發展，次以錢謙益與朱彝尊對列並舉，最後展現貶錢尊朱的立場，對於《靜志居詩話》有著正面評價。因此，以「別集類」〈提要〉為研究對象，以館臣「文學史」圖像及其形成為研究視角，應能豐富《總目》文學思想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總之，本計畫以《總目》為研究對象、「別集類」〈提要〉為研究材料、館臣實際批評中的歷史敘述（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為視角，討論隱藏在敘述文字底層的歷史解釋（即題目、下文所稱謂的「敘解」）內容與模式，並且擴及模式背後館臣自我重構的內涵與意義。

2. 文學研究與歷史——〈集部總敘〉、〈別集序〉所建構的歷史敘述、解釋模式²⁷

當代史學家丹圖（A. Danto）和利科（Paul Ricoeur）曾指出「歷史敘述」、「歷史解釋」是不可分開的，即「歷史解釋的邏輯，就是通過對對象是如何的敘述，而達到對其為何如此的解釋」「敘述在歷史中具有其它解釋方法所不能取代的優先地位。換言之，一切歷史解釋首先和必然是敘述的」²⁸因此，「歷史敘述」就是一種歷史的「敘解模式」（Historical Narrative Model），在敘事（「歷史敘述」）的底層仍具有強烈的解釋意義（「歷史解釋」）。若此，德學史學家宙恩·呂森所認為的：「通過敘述的方法，人的大腦掌握了偶然性。它賦予了發生在人類社會變化中的事件的時間序列某種意義。這樣，人類就可以在文化方面受到人類世界和人類自身的時間連續性觀念指導。」²⁹據此可以說明：「歷史敘述」與「歷史解釋」，並非出於單純外物（過往的歷史事件）與自我（敘解歷史事件者）的斷裂關係，而是一種相攝互涵的關係，在敘述與解釋的過程中，個別事件在時間中的偶然性，得到序列化，並紛紛被賦予某種意義。甚而，人將受到人類世界與人類自身的「時間連續性觀念指導」，從而產生面對未來的動力。

²⁶《總目》，卷一百九十、集部四十三、總集類五，頁5（冊）—105-106。

²⁷〈提要〉的歷史解釋多夾於歷史敘述中，且當代學者甚而認為「歷史敘述」具有「歷史解釋」的性質，故本文以「敘解」一詞稱之。

²⁸參見周建漳：〈當代西方哲學關於『歷史解釋』的方法論思考〉，《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2期，頁10-11。

²⁹宙恩·呂森撰，張永華譯、姜凡譯：〈賦與時間意義——以歷史意識為概念基礎的普遍分類學〉，《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01期，頁12。《總目》，卷一百九十、集部四十三、總集類五，頁5（冊）—105-106。

這些當代的史學理論，實能說明《總目》深深隱含館臣的歷史意識、歷史敘述與歷史解釋。

〈別集類序〉³⁰云：

集始於東漢，荀況諸集，後人追題也。其自製名者，則始於張融《玉海》。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畧》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於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後，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著錄，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錄，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舊編日減，豈數有乘除歟？文章公論，歷久乃明。天地英華所聚，卓然不可磨滅者，一代不過數十人。其餘可傳不可傳者，則繫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異也。今於元代以前，凡論定諸編，多加甄錄。有明以後，篇章彌富，則刪薙彌嚴。非曰沿襲恒情，貴遠賤近。蓋閱時未久，珠璣並存，去取之間，尤不敢不慎云爾。

在這段文獻中，表層述說集部書籍的發展，尤其是集部體例與數量的發展狀況。但其中亦表露某種主觀性，即顯豁公論之標準、去取刪薙之慎重。此外，「天地英華所聚，卓然不可磨滅者，一代不過數十人。」之說，更代表四庫全書之纂集，除了保存文獻外，另有發掘佳著之目的。如此深沉之意義，在〈集部總敘〉³¹亦有說明：

大抵門戶構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者聚黨分朋，往往禍延宗社；操觚之士，筆舌相攻，則未有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已，與朝廷無預，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嚴嵩為察相，而以殺楊繼盛為稍過當，豈其捫心清夜，果自謂然？亦朋黨既分，勢不兩立，故決裂名教而不辭耳。至錢謙益《列朝詩集》更顛倒賢姦，彝良泯絕，其貽害人心風俗者，又豈尠哉！今掃除畛域，一準至公，明以來諸派之中，各取其所長，而不回護其所短。蓋有世道之防焉，不僅為文體計也。

明代以降，門戶之見愈發顯明，雖然文人詞翰所爭的只是名譽，但《四庫全書》的纂集，乃至《總目》的書寫，無一不具有「世道之防」的價值與意義。換言之，館臣也多從這個角度省視歷史發展、歸納歷史經驗、建立歷史敘述與解釋，甚而形成一套模式。

對於「至公」「公論」的期待與追求，是館臣的基本立場，而其立場的終極目標在「用見聖朝彰善癉惡，悉準千秋之公論焉。」³²的當代關懷，這亦涉及自我文化內涵的建構問題。因此，通過館臣的歷史敘述，考察敘解的基本模式，進而掌握自我建構的意義與價值，便是本計畫的核心議題。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論題的展開，是建立在《總目》「別集類」〈提要〉的研究上。事實上，若將「集部」著作視為類今文學著作，那「別集類」〈提要〉對別集的描述、詮釋與評價，就屬「文學批評」的範圍了。而館臣的「批評」有何特色呢？當我們在面對〈提要〉文本時，不難發現其具有作者鮮明的歷史意識。其意識之發動，至少受到兩項因素刺激：首先，館臣所面對的著作即是歷史成品，所以歷史意

³⁰ 《總目》，卷一百四十八、集部一、別集類一，頁4（冊）-12。

³¹ 《總目》，卷一百四十八，頁4（冊）-1。

³² 《總目》，《總目》，卷首三、〈凡例〉，頁1（冊）-38-39。

識便自然運作發用。其次，館臣企圖經由歷史經驗結合現實問題，以指導未來趨向。當歷史意識萌動之後，它們對偶然的歷史事件進行理解，甚而產生解釋與描述。一切歷史敘解必然帶有主觀性，可是館臣卻一再強調追求的是「一本至公」的「公論」。《總目》〈凡例〉第十六條云：

文章德行，自孔門既已分科，兩擅厥長，代不一二。今所錄者，如龔詡、楊繼盛之文集，周宗建、黃道周之經解，則論人而不論其書；耿南仲之說《易》、吳玘之評詩，則論書而不論其人。凡茲之類，畧示變通，一則表章之公，一則節取之義也。至於姚廣孝之《逃虛子集》、嚴嵩之《鈐山堂詩》，雖詞華之美，足以方軌文壇，而廣孝則助逆興兵，嵩則怙權蠹國，繩以名義非止微瑕。凡茲之流，並著其見斥之由，附存其目，用見聖朝彰善癉惡，悉準千秋之公論焉。

館臣將姚廣孝《逃虛子集》與嚴嵩《鈐山堂集》置於存目書中，並於〈提要〉內書寫被排斥的理由³³，而其理由背後充滿「公論」的諦造與實踐。館臣一方面服膺千秋以降的公理，一方面欲成就「彰善癉惡」的目的，這些都顯露知識型態「知論」的最後趨向。於是，「公論」³⁴的概念兼含「時間性」與「道德性」。其「時間性」來自堅信古今存有恆長不變的真理，而「道德性」乃為真理的主要內涵。兩者又相互作用，即道德支撐時間之永恆；時間之永恆鑄造道德之高顯。「道德性」是官方論斷與運作之「道德性」，當然，其「時間性」則為保障論斷與運作為合理者之重要基礎。對於歷史的掌握，館臣通過考據型態展開論述，但終而不免以主觀態度涉入，其至少包括官方權力下的一切關懷。就此看來，《總目》雖力求思辨、解釋在操作層次上的客觀性（或許，這將「公論」的概念帶入了方法學的意義），但終究取代不了館臣們的前理解與目的嚮往等主觀性（此處的「公論」即為目標、理想之意）。因此，本計畫的具體焦點，亦在探究館臣來自自我期待之「公論」，具有哪些客觀意義與主觀意義？順此意義的彰顯，回應當代對《總目》研究上的呼籲。

綜上言之，本研究乃有意重建《總目》「別集類」的歷史敘述；次而考索其敘述表層與內在結構的關係，如內在的社會意識、藝術意識瀰漫於圖像表層之狀況；進而顯豁其圖像特色，以便重新詮釋、評估官方文學思想（「公論」）的意義與價值，甚而點出官方思想在「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故本研究企圖回應上述學術背景，以達成下列目的：

（一）擴大《四庫》學的研究主題：

若就林慶彰先生主編的《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參、四庫學〉³⁵、侯美珍先生〈「四庫學」相關書目續編〉³⁶考察，不難發現關於文學研究的部分，遠不及察考古籍版本的源考、校對補正文獻字句的異同、勾勒編纂過程與纂者生平等等屬於考據性的研究；而在少數的文學研究部分，《總目》「別集類」的研究更為鮮少。所以，本計畫應可擴大《四庫》學（《總目》）的研究主題。

（二）填補中國文學思想史的研究空隙：

本計畫欲透過歷史的稜鏡，以《總目》「別集類」為基礎，掌握其對於前朝文集的理解內涵，以填補官方文學思想在中國文學思想史的內容。

1. 甦活文學思想史中固化的印象：

在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上，官方意識通常被視為具有霸權性、保守性的意識，可是霸權與保守的

³³《總目》卷一百七十五，「集部二八·別集類存目二」，〈逃虛子集提要〉：「（姚廣孝）初 僧為名道衍，字斯道，洪武中以僧宗勛薦選侍燕邸。燕王謀逆，資其策力居多。……其詩清新婉約，頗存古調，然與嚴嵩《鈐山堂集》同為儒者所差稱。是非之公，終古不可掩也。」頁4（冊）-653 《總目》卷一百七十六，「集部二九·別集類存目三」，〈鈐山堂集提要〉：「王世貞《樂府變》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論也。然 迹其所為，究非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者比。故吟咏雖工，僅存其目，以昭彰癉之義焉。」頁4（冊）-690。

³⁴關於「公論」的細部討論，可參見龔詩堯：〈《四庫全書總目》之文學批評研究〉，國立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6，頁76-106。

³⁵林慶彰：《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臺北：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1）。

³⁶侯美珍：〈「四庫學」相關書目續編〉，《書目季刊》第33卷3期，1999.9。

形成，應有一定的對治問題，甚至是起於某種集體的焦慮感。而當它一旦成為論述，在相對單元的社會結構中，自會產生一定積極支配或濡化浸染的效果，而逐漸掩蓋某種思想在萌動之初的情狀。因此，面對中國文學思想(史)中的官方意識，並且重新爬梳釐清，應可豐富文學思想(史)的樣貌，甚而掌握其特質。

2. 延續個人研究：

就個人研究而言，本人已完成《總目》「詩文評類」〈提要〉之研究，著有《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平評類」的文學思想》乙書；已完成《總目》「總集類」〈提要〉之研究，著有〈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學思想〉。茲藉往昔的研究經驗與心得，將對象擴及「別及類」〈提要〉，以期完成《總目》集部〈提要〉的整體研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討論《總目》「總集類」的再批評內容，其中，以歷史的敘解圖像做為探察的核心，然後詮釋、評估館臣自期的「公論」之價值與意義。故本研究的前端問題為——歷史表層與內在結構有何關係？

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歐美文化界與文學界中，出現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其對文本與歷史的態度，大抵如下³⁷：

歷史是一個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壓縮的歷史。歷史與文本構成了生活世界的一個隱喻。文本是歷史的文本，也是歷時和共時統一的文本。歷史不同於矢量的時間，歷史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過程，在其中不可逆轉性一再重複出現，過去與未來在文本意義生成中瞬間接通。歷史視界使文本成為一個不斷解釋而且被解釋的螺旋體。歷史語境使文本構成一種既連續又斷裂的感覺和反思空間。歷史高於文本，過程大於結果。

這種態度是對於將文學形式視為（文學研究）中心的背離與修正，某程度返回俄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等等學說之前的思想，著重文本的歷史性。文本成為有意義的形式，是經過某種語言具體化、客觀化的結果；而凝聚成形的力量，端賴整個歷史的力量。所以，（語言）文本只是被壓縮的歷史，在（語言）文本之外，還有一個未經語言塑形的文本。換言之，經形塑的文本是壓縮的歷史，且是整個歷史「過程」的一部分，亦是歷史過程中某種客觀化的「結果」。從後代人的立場來看，歷史就是（語言）文本的延伸文本。因此，文本永遠是歷史的文本，它隱含生活世界的隱喻。可是，歷史又具有不可逆轉性，故文本所重複的歷史，是一個經過「解釋」的歷史，正因如此，文本也就成為可「被解釋」的形式，而為一「螺旋體」。文本既為「螺旋體」，歷史又具不可逆轉性，故文本所再現的歷史，不會是「真實」的歷史，它只是一個含帶歷史隱祕的載體。至此，「新歷史主義」的「不可逆轉性」，又使其與「歷史主義」有了差別。

新歷史主義是混雜著馬克思主義、傅科哲學、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等思想的理論，姑不論其細節，新歷史主義乃嘗試以階級、權力、性別、種族等角度，解讀文本、理解歷史。本計畫以《總目》「別集類」〈提要〉為研究對象，而該文本是《四庫》館臣面對前代文本的歷史解釋，而其解釋一旦成為文本，旋即成為被解釋者。本計畫乃帶著新歷史主義的基本態度，一方面重建《四庫》館臣的批評史圖像，另一方面尋索關於圖像的「隱喻」。

至於「隱喻」的概念，在研究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的海登·懷特（Hayden White 1928-）《史元》中³⁸，

³⁷ 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4），頁 396。

³⁸ 海登·懷特著，劉世安譯：《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12），下冊，頁 575-576。

有許多論述：

若於正規史著與演繹性歷史哲學必有所區別，則有別者乃是二者之強調方向，而非內涵之互異。以正規史著言，其之建構元素，係散置於敘事內部，嘗於故事脈絡中，立於明顯主要地位者，乃是採訪 (found) 所得史料元素。而演繹性歷史哲學，則循相反方式，係將觀念建構元素攜至表層，明白推演，並施以系統性析辯，至於史料部分，其主要功能僅為闡明或徵驗。故筆者結論乃謂，正規史著之元素中，即包含有歷史哲學，而完整綻放之歷史哲學，其眾元素中，又莫不包含有正規歷史。

歷史著作³⁹與歷史哲學有著內在相同性，即「建構元素」同樣存在兩種敘述書寫中。只是在論述的表層，歷史著作將建構元素散置於敘事內部，其表層為史料所構成的故事脈絡；歷史哲學則將建構元素直接置於表層，至於史料及其所構成的故事，便是做為闡明或徵驗而已。

就此看來，歷史著作的敘事文本均有其內層結構，而內層結構的本質，「通俗說法是屬於詩學，專業說法則屬於語言學」⁴⁰因此，歷史文本即是具有文學虛構性的文本。歷史文本的虛構性主要來自精製情節、正規析辯詮釋法及意識形態。懷特說⁴¹：

敘事，或稱事件的句法散居 (syntagmatic dispersion)，通過作為散文話語的系列，表現出一個綜合形式的闡釋，可以代表話語所採用的「內在趨向」(inward turn)，向讀者展示事物或人的真正模式。……敘事的最初模式解構比喻模式中編碼的事件系列(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事列)，然後在另一個比喻模式中重構事件系列。這樣一來，敘事就成為解碼和重新編碼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個新的比喻模式代替了原初由常規、權威、習慣所編碼的比喻模式。因此，敘事的闡釋力量依賴原初編碼與重新編碼的對立。

敘事活動就是一個不斷重新編碼的活動，而在編碼的過程中，「敘述的故事凝塑成一特定類型故事，並為該故事注入『意義』」⁴²這即為精製情節詮釋法。海登·懷特循精製情節詮釋法的語相，區別四種樣式：傳奇式、悲劇式、喜劇式、譏諷式。⁴³換言之，符碼的內容是事件系列，而編纂的意義除了是建構之外，也含帶對於原初編碼的衝撞，甚或取代。值的注意的是，如此取代並非故事外貌的取代而已，更是「意義」的取代。史學家將自己的析辯詮釋與意識型態，展現在歷史圖象的深層結構中，所以每個歷史敘事自有其面貌。至於深層結構表諸於敘事文本，其方式不外於詩學、語言學中的隱喻、轉喻、提喻、諷喻四種類型⁴⁴。

³⁹ 本文以歷史著作代稱「正規史著」的概念，在此指通過史料而勾勒歷史圖像而言，懷特或稱為“historiography”(歷史編纂)，其在〈「描繪逝去時代的性質」：文學理論與歷史寫作〉指出：「過去的事實，這是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歷史編纂，這是歷史學家關於這一對象所寫的話語；以及歷史哲學，這是對上述對象和上述話語之間可能關係的研究。」即對歷史著作與歷史哲學做出基本區分。該文收入拉爾夫·科恩主編，程錫麟等譯：《文學理論的未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6)，頁46。

⁴⁰ 同註38所揭書，上冊〈序言〉，頁xxvii。

⁴¹ 海登·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本文〉，該文收入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5)，頁176。

⁴² 同註38所揭書，頁10。

⁴³ 傳奇式主要以「英雄之超凡成就並自俗世得到解脫為表徵」、「強調救贖」；譏諷式「乃以人類最終仍為天地之囚徒而非其主人」、「強調消散」；喜劇式乃「將人類暫時克服其所居之世界，植基於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正在運作之各種力量間之偶而妥協。而此種妥協又以歡樂合作為表徵，喜劇作家慣已歡樂場合作為其對於變遷、蛻化敘述之結尾。」；悲劇「結尾所顯示之妥協，則較為陰鬱，其特質係顯示人類對於環境必然較認命，處於此情勢之下，人類必須辛勤努力。」同上註，頁10-13。

⁴⁴ 海特認為在歷史敘述的過程中，需要塑造出事件間的因果律，故他自歷史敘述裏區分四種歷史詮釋的典範，其分別為：形式論者、有機論者、機械論者、文脈論者。至於意識型態，乃指處身在現世社會習尚之下，欲對社會有所作為而持有之

《總目》雖非全部透過精製情節而形成歷史圖像，但其述評各作家、作品時，本質是歷史理解，文本則為兼具述評的歷史著作，因此，其內容應仍為喻法的表現。又借用新歷史主義前驅人物傅科的權力概念，我們應可將《四庫》館臣的「公論」視為官方權力的某種表述，甚或支配，而其權力之瀰漫乃構成歷史評述的內容。

事實上，新歷史主義者的見解，與中國史學傳統，頗有相通之處。如孟子曾指出：《春秋》乃為「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⁴⁵之著作，「事」為歷史事件，「文」為重新編碼的敘事文本，「義」則為史家的意見。此外，《春秋》的「微言」，則又與懷特所說的喻法有相似之處。而司馬遷的「述往事，思來者」⁴⁶「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⁴⁷則充分將歷史敘述的主觀性（「成一家之言」），以及文本乃將過去（「往事」現在（「述」與「思」的活動）、未來（「來者」），做一瞬間接通，亦通於新歷史主義者的理解模式。總之，無論從新歷史主義或《春秋》學、《史記》等中國史學精神看來，歷史圖像含帶史家的主觀性，實為一相通之觀念。因此，視《總目》「別集類」〈提要〉中文學批評史的圖像為某種隱喻，則成為整個研究的基本預設。

四、討論與結果

本計畫的成果計有：

1、〈被隱藏的聯繫性：《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史敘述〉

本文原宣讀於淡江大學主辦「第十一屆文學與美學國際研討會」（2009.5）〈《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思想〉一文，周彥文教授為特約討論人。應會議單位邀約，參酌會議中之討論意見，修訂改寫，復經期刊匿名審查通過後，發表於《淡江大學中文學報》，第廿一期，2009.11。重要結論為：

- (1)《總目》別集類〈提要〉的詩歌史圖像，可分別以「俳偶」、「渾厚」、「諧雅」、「雕琢」予以掌握。
- (2)館臣對於「俳偶」、「雕琢」的詩風，視其程度而有褒貶。至於褒揚的標準，在於儒家詩學「溫柔敦厚」、「興觀群怨」（參見〈御選唐宋詩醇提要〉）。換言之，館臣能夠正視文學創作由簡樸入於繁華的歷程與結果，並且予以包容。只是，這包容並非無核心價值的開放型態。
- (3)館臣認為開元、天寶（即盛唐）為唐詩的轉變階段，其風尚以氣象渾厚涵蓋之，此應以李、杜為代表（參見〈御選唐宋詩醇提要〉）。王、孟一派雖受館臣重視，但難以渾厚稱之。又王昌齡等邊塞詩風，則未見著墨。
- (4)盛唐與中唐之間，為另一轉變階段，即詩風趨於「浮響」。
- (5)中唐元、白詩因淺切、淫靡，可謂「浮響」的表現，因此不受館臣喜好。至於韓、孟一系，倒受青睞。但這基本觀點，又與《總目》若干〈提要〉背背。
- (6)《總目》肯定韓愈古文「冠絕一時」，但也描繪韓愈與前行者的關係，此異於北宋以降獨尊韓愈地位的論述。
- (7)《總目》「古文」的概念，至少包涵三層意義：第一、時間意義，即相對於今時之文。第二、語言表現意義，即相對於俳偶之文。第三、宗旨意義，即指古文應具儒家仁義思想，並協聖

方案，而他[進一步區分四種意識形態的立場：無政府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自由主義。結合正規析辯、意識型態與精製情節，便構成史家著述的個別風格。另外，海特認為要將歷史敘述客觀化以呈顯外現，乃需通過比喻法。而比喻法可分四種：隱喻——「藉彼此相似抑或互異之語辭，經由類比或直喻，刻畫某一現象之特質」；轉喻——「即一物之全稱，可藉該物部分之稱謂予以取代」；提喻——「其係就賦與整體之性質中之部分，以表徵整體」；諷喻——「凡是將字義文面肯定之物，於象徵層面中予以否定」簡言之，隱喻本質是代表、隱喻是化約、提喻是整合、諷喻則是反語。參見註 38 所揭書，〈導論：歷史之詩學〉，上冊，頁 3-54。此外，本文引朱立元所說，其「隱喻」為廣義者，實包含海登·懷特的四種喻法而言。

⁴⁵【清】焦循：《孟子正義》，（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7），頁 574。

⁴⁶【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11），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頁 834。

⁴⁷【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11），卷六十二，〈司馬遷傳第三十二〉，頁 697。

賢之軌。

(8) 在「古文」的語言表現意義上，「斲雕爲樸」的說法，相對壓縮了唐代古文與前代文的繼承關係。

(9) 在「古文」的宗旨意義上，壓抑了唐代古文作家不同的學術取向。

(10) 《總目》雖重視唐代古文的發展與價值，但未全然否定華麗文辭的價值。

2、〈林中路：《四庫全書總目》文學思想研究芻議〉

本文內容原應香港教育學院語文學院主辦「中國文學批評研究工作坊」(2010.4)邀請而撰寫。該工作坊會談由張少康教授主持，臺灣學者計有顏崑陽、蔡英俊、鄭毓瑜於、廖棟樑等教授，香港與大陸學者有陳國球、張宏生、張健、汪春泓教授共同出席，彼此發表研究經驗並進行討論，故會中多受啓發。會後經修改、審查，發表於日本長崎中國學會主編之《長崎中國學會會刊》創刊號，2010.7，同時宣讀於長崎大學、長崎中國學會主辦之「東亞漢學的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日本長崎大學，2010.7)。內容以歷史敘解、自我瞭解、形塑遠景爲視野，討論《四庫總目》的「自我」內涵及其文學思想，側重《總目》特色與研究方法之討論。

3、〈製作譜系：《四庫全書總目》唐宋古文的歷史敘述及其文學思想〉

本文應邀發表於天津南開大學文學院主辦「中國文學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7)，重要結論爲：

(1) 館臣的古文譜系，以八大家爲主幹。

(2) 古文譜系以韓愈與歐陽修爲「極變」之人物，二人各有前行者與追隨者，並形成線性發展。

(3) 譜系非出於不自覺的慣習或常識，而是受成見系統所趨動，故有「製作」之意。

(4) 「古文」一詞，包含三層概念：第一、時間概念，即相對於今時之文。第二、語言表現概念，即相對於排偶之文、八股之文。第三、宗旨概念，指古文具有儒家仁義思想，並協聖賢之軌。

(5) 「古文」的語言表現概念——斲雕爲樸，可能取消唐宋古文與前代文學的繼承關係。

(6) 「古文」的宗旨概念——儒家思想，可能壓抑古文作家不同的學術取向。

(7) 館臣雖重視古文地位、價值，但不全然否定華麗文藻、其他文體的價值。

(8) 館臣「製作譜系」的行爲，複合著史家的現實處境及其回應。所以，古文與時文的生衍關係、本質關係、學習方法，皆是出於科舉制度下的省思。尋求古文與時文的內在溝通，可鞏固國家選拔人才之制度，保障國朝治術順利運作。

(9) 館臣「製作譜系」最終目標仍在於「公道大彰」(〈凡例〉15語)、「用著勸懲」(〈凡例〉9語)，以維持國朝不墜。

本文修訂中，擬投稿於學術期刊。

4、〈眾水歸海：《四庫總目》文學思想的凝結歷程〉

本文應台大中文系主辦「文化史視野下的文學批評學術研習會」(2010.11)發表。在《總目》研究的過程中，「自我」的具體身分的指涉，爲一個重要的課題。本文以《武夷新集》爲觀察對象，比對分纂提要、《薈要》提要、閣本提要、《簡目》提要、《總目》提要，發現《總目》〈提要〉是從翁方綱分纂〈提要〉逐漸轉變而成的，而與其他提要互有異同。如此說來，在環繞四庫全書編纂所產生的諸種提要，可能成爲探討「自我」具體身分時的重要材料。會中承蒙淡江周彥文教授評論，會後獲得香港陳國球教授等學者寶貴意見。

5、〈所見與不見：《四庫全書總目》視野下的《漁洋詩話》〉

本文原發表於彰化師範大學吳彩娥教授主持之「詩話與詩學、文化：清代篇」研讀會(該會獲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人文學專家著作研讀會」99年度補助，2010.9-2011.2)，後經改寫發表於《中孚大有集—黃慶萱教授八秩高壽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1.3)頁515-536。在《四庫總目》中，《漁

洋詩話》原屬「詩文評」類，但若要觀察館臣對於王士禛《漁洋詩話》整體的述評及其得失，則需兼及別集類提要，本文為綜合近年來來研究成果的論文。

上此外，目前仍以元明清別集〈提要〉為材料，繼續撰寫相關研究成果，俟日後發表。又，本計畫涉及思考、探討「批評語境」一問題，而這問題意識結合時代感受，促使我轉向觀察當代文學批評家，於是完成兩篇延伸性的研究成果：1、〈存在感受下的「意義重建」：龔鵬程先生與抒情傳統論述〉，收入《學海奇觀—龔鵬程學思初探》（臺北：學生書局，2010.12）頁 105-121。2、〈融合與重鑄：高友工與當代新儒家〉，發表於淡江大學中文系主辦「第十二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5.13-14），會後經修改，目前由《淡江中文學報》審稿中。3、由於朱自清強調「詩文評」為「文學批評」的先聲，他並致力中國「文學批評」之建立，故「詩文評」於現代化轉型的狀況與意義，為本計畫延伸議題之一，因此預計在 2011 年 11 月香港教育學院舉辦的「文·學·文學批評：中國文學批評的現代意義工作坊」，以「朱自清《詩言志辨》與中國『文學批評』」為題進行報告。

五、成果自評

（一）基礎工作與成果

依照計畫書執行工作與成果如下：

- 1、研讀《總目》基本文獻，並註解九百五十四篇重要提要。
- 2、因應實際需要，增加比對《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書前〈提要〉異同之工作。

（二）發表論文

1.會議論文：

- （1）曾守正、2010.11、〈眾水歸海：《四庫總目》文學思想的凝結歷程〉、台大中文系主辦「文化史視野下的文學批評學術研習會」
- （2）曾守正、2010.7、〈林中路：《四庫全書總目》文學觀研究芻議〉、長崎大學、長崎中國學會主辦之「東亞漢學的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曾以發言稿形式應邀發表於香港教育學院語文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中國文學批評研究工作坊」（2010.4.24））
- （3）曾守正、2010.7、〈製作譜系：《四庫全書總目》唐宋古文的歷史敘述及其文學思想〉、天津南開大學文學院主辦「中國文學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 （4）曾守正、2009.2、〈《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思想：以詩歌史圖像為觀察角度〉，日本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環中國海研究學會、長崎中國學會主辦「第四屆環中國海國際漢學研討會」
- （5）曾守正、2009.5、〈《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思想〉，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第十一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武俠小說』及『文學理論』」（本文據前文修訂，並擴增「古文」論題）

2.期刊論文

- （1）曾守正、2010.7、〈林中路：《四庫全書總目》文學觀研究芻議〉，日本長崎中國學會主編《長崎中國學會會刊》創刊號。（同會議論文）
- （2）曾守正、2009.12、〈被隱藏的聯繫性：《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思想〉，《淡江中文學報》，第二十一期。（據會議論文修改）

3.專書論文

曾守正、2011.3、〈所見與不見：《四庫全書總目》視野下的《漁洋詩話》〉、《中孚大有集—黃慶萱教授八髒高壽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1.3）（初稿曾發表於化師範大學吳彩娥教授主持之「詩話與詩學、文化：清代篇」研讀會（2010.9-2011.2））

4.其他（延伸成果）

- （1）曾守正、2010.12、〈存在感受下的「意義重建」：龔鵬程先生與抒情傳統論述〉，《學海奇觀—龔

鵬程學思初探》(臺北：學生書局，2010.12)

(2) 曾守正、2011.5、〈融合與重鑄：高友工與當代新儒家〉，淡江大學中文系主辦「第十二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3) 指導相關學位論文：謝佩真、2011.7、《製作明代前後七子—以清初、中期三書為探討核心》

六、參考文獻

- 1、曾守正：〈《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初稿）——考察「公論」下的宋前、宋代文學批評史圖像〉，第二屆環中國海國際漢學研討會，(日本)福岡大學，2006年12月9、10日。已收入《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
- 2、曾守正：〈《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考察「公論」下的宋前、宋代文學批評史圖像〉，《輔仁國文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年2月，頁73-101。已收入《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
- 3、曾守正：〈《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以明代批評史圖像為考察對象〉，第十屆文學與美學暨第二屆中國文藝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淡江大學，2007年6月21、22日。已收入《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
- 4、曾守正：《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9)【獲國科會人文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 5、曾守正：〈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學思想（初稿）〉，2007年第九屆東亞漢學暨檀國大學60週年校慶學術會議、(韓國)檀國大學，11月09、10日。修改後刊登於《書目季刊》
- 6、曾守正：〈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學思想〉，《書目季刊》第四十一卷第二期，2007.09。
- 7、曾守正：〈在「抒情傳統」之外：官方文學論述研究的省思〉，《淡江中文學報》第十七期，2007.12
- 8、楊雅筑：〈《四庫全書總目》詩話界義與作品分類析論〉，第二屆環中國海國際漢學研討會，(日本)福岡大學，2006年12月9、10日。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研究內容與原計畫構思大致相符，且已發表部分研究成果。原計畫書期望日後以專書方式呈現研究成果，故修改期刊論文為專書內容，並豐富相關內容，成為今後努力持續的方向。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說明：已發表兩篇學術期刊論文，另有一篇會議論文修改後將投稿至學術期刊。此外，已發表專書論文一篇。又，目前尚以明清別集提要為範圍，撰寫論文中。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為限）

本計畫為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研究，期待透過文學詮釋的向度，達成兩項學術意義：第一、拓展《四庫全書總目》的研究領域，為《四庫》學及《總目》研究注入新觀念與新方向，使《總目》在工具、參考性質之外，得以顯豁文化內蘊與價值。第二、自官方文學思想的脈絡，重建《四庫》館臣的文學思想。此舉一方面為百年來文學批評史、文學思想史敘述，因以「抒情的」「審美的」做為文學主要內涵所造成的遮蔽，進行遮撥廓清；另一方面填補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或文學思想史的內容，增益乾、嘉文學的豐富內涵與客觀發展，並對舊有「神韻、格調、肌理、性靈」四分的清代詩學論述，提供其他思考向度。

本計畫以「歷史理解」的性質、中國「提要」的導引性質為研究的理論基礎，然後依據《總目》〈提要〉文學述評的相關文獻，試圖重建館臣的文學史敘述，釐清敘述底層的解釋內容及其模式，並且從敘解模式中探索館臣觀看歷史、關懷當代的「自我」內在結構。在研究過程中，值得進一步考察的問題尚有：

第一、館臣著重詩學討論，擇取儒家「溫柔敦厚」、「興觀群怨」的詩教觀，做為文學思想的主要根柢，自不待言，但此不意味館臣跨越現象層次的文體差異，偏舉詩體以包攬眾體，甚至以詩教觀念簡化或覆蓋各種文體的特性與效能。本計畫以唐宋「古文」為討論基點，旁及「時文」（八股、駢文），即可證明館臣在文體觀念上，自有其複雜度。當然，《總目》也有自我時代的限制，如「詩文為中心，詞曲（散曲）為邊緣，白話小說、戲曲受排斥」（吳承學語），無論如何，館臣的文體觀念實應另做討論。

第二、《總目》「集部」內有一「詩文評」類，民初學者以現代知識類型相比配，謂為文學批評（類）或文學批評（類）的先聲（如朱自清之見）。此說若可成立，「楚辭」、「總集」、「別集」、「詞曲」諸〈提要〉，亦可被視為實際批評的文本。循此而下，現代「文學批評」的意義和發展，與成諸十八世紀末的《總目》，在論述形式、觀念等方面，有何轉化上的關聯與意義，就值得進一步考察。

第三、在《總目》中，敘解歷史的「自我」結構，為一「崇真」（知識層）與「教化」（政治層）的二重複合結構。但是，主宰並鞏固這結構的個別身分為誰？則是《總目》研究的困難議題之一，此即《總目》的作者是誰的問題。《總目》的成型，實在歷經許多時間，耗費眾多人力，如果我們回到《總目》〈提要〉的前身，將《四庫》諸提要（採進、分纂、閣本、薈要、簡明）與《總目》予以細密比對，跟隨刪改修訂的脈動，或許可以稽得鑄造「自我」結構的歷程。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2009年5月25日

報告人姓名	曾守正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時間 會議 地點	2009.02.16-2009.02.17 日本長崎大學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會議 名稱	(中文) 第四屆環中國海國際漢學研討會 (英文)		
發表 論文 題目	(中文) (英文)		

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會議開幕式由環中國海學會高柏園理事長及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連清吉副部長分別代表致辭。

會議由淡江大學高柏園副校長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儒道思想與全球化」。演講內容為：因應全球化在知識、經濟、政治以及文化四方面所產生的（一）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馬太效應」，（二）M型化社會，以及（三）百分之八十的資源被百分之二十的人用掉的「2/8原則」等分配失衡的環境現象，儒、道兩家應在重新關心文化之際，應對此種現象提出改善的建議，並舉出唐君毅、劉述先、杜維明及李瑞全等四位當代國內外新儒家的因應之道，進而對此四位新儒家觀點進行反思批判。高副校長最後認為：因應全球化知識、經濟、政治的危機，唯由透過文化的積極「對話」，走出封閉的「獨白」時代，尋求世界倫理、普世價值，除了建立君子「和而不同」的「理一分殊」領導性原則之外，更應該提出「次級原則」以解決個案問題，此時朱熹「格物致知」理論即能在此一時代意義脈絡下，重獲新詮。高教授從中國文化儒道思想內蘊，提出關於當代全球化之反省，見解深刻，發人省思。

中午用餐後，前往拜會長崎中國學會及長崎大學環境研究學部，並由長崎大學環境研究學部部長接見，討論臺日學術、教育交流事宜。

在論文發表與討論部分，臺灣由本人、德明科大通識中心主任吳秋慧教授、臺師大國文系胡衍南教授、政大中文系林啟屏教授、臺師大國系江淑君教授、東吳大學歷史系邱琳婷講師、臺師大國系李幸玲教授發表論文，講題包括文學、文化、哲學及宗教等面向：〈《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思想〉、〈永和春色千年在：側觀唐代文士的「蘭亭」印象〉、〈小說史的空白——論清代中期世情小說〉、〈儒學思想中的歷史觀——以出土文獻為討論起點〉、〈薛蕙《老子集解》對程、朱老學之評議〉、〈歷史意識中的世界圖像——以錢單士厘《歸潛記》為例〉、及〈法雲對《法華》授記敘事策略之詮釋——兼論與當代西方詮釋學的對話〉。日本由長崎大學連清吉教授、楊曉安教授、長崎縣立大學祈建民教授、周國強教授發表〈宮崎市定的東洋近世論〉、〈獨詞疑問句的漢日語差異〉、〈從水權看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戰前中·韓·台留日學生的文學回顧〉發表論文。整體說來，論文推論細密、論點各具新意；與會學者討論深入、熱烈。

此外，臺日學者就兩國漢學研究交流進行意見交換，並由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研究生介紹自己的研究領域，以及未來可能來臺留學的規劃，深具實質意義。

二、與會心得

環中國海學會為臺灣跨校漢學學者組成之學會，長崎中國學會為日本長崎地區跨校漢學學者組成之學會，故具有開放性。此次由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提供會議服務，讓台、日學者得以交流，並使日本地區漢學研究所學生得以參與討論，此舉實有助於臺灣學術成果向國際展現，且俾全體參與者擴大研究視域。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省略)

四、建議

1. 中國漢學與日本漢學具有豐厚的學術淵源，且各具特色，若臺灣之漢學研究者能多與日本漢學界接觸、交流、合作，應更能擴大漢學研究領域與深度，增強臺灣漢學界之國際影響力。敬盼國科會能繼續支持。

2. 日本長崎大學具有悠久校史(自前身醫學講習所算起，已歷一個半世紀)，且擁有重要研究成果(該校名譽教授下村脩先生獲得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此次會議之餘，該校之姐妹學校淡江大學高柏園副校長持續推動兩校交流，而政治大學中文系林啟屏主任、本人與該校代表商談兩校實質合作之相關事宜(預計近期簽訂兩校交流協定)，故敬盼政府能夠大力支持各校為國際交流之努力。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會議議程、與會發表學者之論文資料一份。
2. 楊曉安教授惠贈著作三冊。
 - (1) 白河方言研究，楊曉安，札幌：共同文化社
 - (2) 漢言散點透視，楊曉安，札幌：共同文化社
 - (3) 中日兩言語の比較研究，楊曉安，札幌：共同文化社

六、其他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2010年7月13日

報告人姓名	曾守正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時間 會議 地點	2010.07.09-2010.07.10 天津南開大學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會議 名稱	(中文) 中國文學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英文)		
發表 論文 題目	(中文) 製作譜系：《四庫全書總目》唐宋古文的歷史敘述及其文學思想 (英文)		

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七、參加會議經過

七月八日報到

七月九日

上午 8:50-9:30 舉行開幕式

會議開幕式由南開大學圖書館長張毅教授主持，南開副校長陳洪教授、南開羅宗強教授，及各地代表顏崑陽教授、施議對教授、朴永煥教授致辭。

上午 10:00-11:50 大會主題演講

由南京大學程章燦教授與本人擔任主席，主講者有顏崑陽教授、施議對教授、蔣寅教授、吳承學教授與趙敏俐教授。其分別由文學史研究、文學觀念「神明」、文體研究、文人階層與文學等議題展開討論。

由於參與會議人數頗多，正式參與名單約有七十人，另有旁聽者，共採兩組進行分組會，本人受邀參與第二組(宋至民國文學思想史組)。

下午 14:30-16:00 第一場

計有程章燦教授、盧盛江教授、曾守仁教授、侯雅文教授宣讀論文，揚洪升自由發言。論文包括《後村詩話》箋釋、文學聲病問題、竟陵派文學思想、陳維崧詞學思想等。

下午 16:20-17:50 第二場

計有朴永煥教授、查洪德教授、孫學堂教授、楊遇青教授宣讀論文。議題以北宋詩與禪學、方回唐詩觀、元明唐詩正變說，唐順之文學思想演變時間考等。

【另，第一組下午兩場共發表六篇論文】

七月十日

上午 8:30-10:00 第一場

由鄧國光教授、阮國華教授、左東嶺教授、許建崑教授發表論文，張弘教授自由發言。內容以明初古文辭風變遷、陳獻章心學與文學思想、良知說與陽明詩學觀、曹學佺生平與作品考。

上午 10:20-11:50 第二場

由孫克強教授發表晚清、民國詞學南北宋之爭議的問題，陳水雲教授發表王蘊章詞學性格。

會中除論文研討會，羅宗強教授亦提出感想，供與會者參考。

下午 14:30-16:00 大會主題演講

由本人主講〈製作譜系〉，袁濟喜教授論西晉文人集團與文學理論、譚帆教授主講〈小說考〉、李建國教授發表對於中國「小說」的界義。

【另，第一組上午兩場共發表七篇論文】

下午 16:20-17:30 總結與閉幕式

由張毅教授主持，汪春泓教授進行第一組會議觀察報告，孫克強教授進行第二組會議觀察報告，左東嶺教授進行整體報告。羅宗強教授總結，陳洪副校長致答謝辭。

八、與會心得

中國大陸關於「中國文學思想史」專業以南開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尤為著名。本人2005年曾出席首師大會議，時隔五年復參與相似會議，深感與會學者所思考之研究方法、具體個案都更為精密、深刻。

此次與會者包括臺灣、大陸、香港、澳門、美國等學者，其中頗多長期浸淫此範圍的優秀學者，故論點具有新意，且推證翔實，有助個人學思參考。臺灣學者共計七人參加，在顏崑陽教授帶領下，將學術成果向國際學人展現，並獲得討論、回饋，此既擴大與會者之視野，並善盡學者之職責。

九、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省略)

會後於十一日上午參觀楊柳青石家大院、年畫博物館，此對天津傳統聚落、民俗活動與成果有了更深刻之認識。下午參觀梁啟超故居及讀書處(飲冰室)，並遊覽天津殖民地建築物之特色。

十、建議

兩岸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者已有多年交流經驗，日後除不定期召開會議外，應可再擴大合作方向，如共同研究等。期望藉此增強臺灣與大陸、國際之交流與影響力。敬盼貴會能繼續支持。

十一、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會議議程、與會發表學者之論文集一冊。
2. 南開大學學報《文學與文化》創刊號與第二期

十二、其他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2010年8月30日

報告人姓名	曾守正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時間 會議 地點	2010.07.24 日本長崎大學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97-2410-H-004-138-MY3
會議 名稱	(中文) 東亞漢學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論 (英文)		
發表 論文 題目	(中文) 林中路:《四庫全書總目》文學思想研究芻議 (英文)		

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參加會議經過

七月二十三日報到

七月二十四日

上午 9:00-9:20 舉行開幕式

會議開幕式由長崎大學連清吉教授主持，台灣淡江大學副校長高柏園教授、中國陝西師範大學陳學超教授，及中國駐福岡總領事館魏能濤致辭。由長崎縣立大學周國強教授進行會務聯繫說明。

上午 09:20-09:50 大會主題演講

演講由長崎大學連清吉教授主持，淡江大學高柏園教授主講，講題為〈朱子思想的定位〉。該內容以陳榮捷、牟宗三先生詮釋朱子地位之異同為核心，並從朱子的哲學地位、道統地位、文獻地位逐一說明，尤其指出牟宗三先生雖以朱子為儒學的歧出者，但未因此予以貶抑，反而從創發角度進行說明。在結論中，特別指出韓國李退溪學會對於朱子地位的捍衛，以說明東亞民間已將儒學當做一種生活、生命、文化的關懷，故漢學發展不能僅從知識分析角度切入。高教授所言，實發人深省。

上午 09:50-10:50 第一場

由長崎大學楊曉安主持，陝西師範大學王暉教授發表〈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大變革〉、李繼凱教授發表〈中國現當代作家論書法文化〉、陳學超教授發表〈國際漢字規範化的艱難與歷程〉等三篇論文，其分別就文化變革的痕跡與意義、現當代作家對傳統文化（書法）的理解與關懷、漢字結構改變的歷程及展望等問題，提出深入分析。

上午 11:00-12:00 第二場

由陝西師範大學陳學超教授主持，計有西北大學賈三強教授發表〈論賈寶玉的雙重異化〉、西北大學劉應爭教授發表〈多幅面孔的魯迅〉、長崎縣立大學松岡純子教授發表〈從日中文學作品看有關「鄭成功」的「傳說」〉三篇論文，分別就賈寶玉的異化現象及其文化意義、魯迅多種面貌（尤其是汪暉、王曉明在八九〇年代時期所述）的內容與轉變、日本文學對鄭成功的敘述與問題。這三篇論文皆從敘述角度展開討論，並牽涉「詮釋」與時代、地域的關係。

下午 13:20-14:20 第三場

由長崎縣立大學祁建民教授主持，由中國傳媒大學張鴻聲教授發表〈「公共領域」、紳商社會與國家性〉、中國傳媒大學李貴森發表〈基督教的中國化〉、政治大學高桂惠教授發表〈太平天國敘事中的親歷文本〉等論文。張文由李歐梵、王德威先生借用西分經驗與概念，發展而成的城市文學研究為思考起點，主張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從斷裂式理解轉為本土化研究，頗具反思性；李文則討論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歷程及其中國化問題；高文則從「太平天國」歷史是如何被建構的做為問題意識，通過文本逐一考察、討論。

下午 14:30-15:30 第四場

由中國傳媒大學張鴻聲教授主持，政治大學陳逢源教授發表〈四書「官學化」進程：《四書大全》纂修及其體例〉、台師大江淑君教授〈秦愚黔首非本於老子〉和本人論文等三篇。陳文論四書經朱子至《四書大全》的發展過程；江文聚焦明人對《老子》六十五章的詮釋，既討論其內部義理，亦思考老子「愚民」之說的內容、後世詮釋《老子》思想諸問題。本人則回顧《四庫全書總目》的研究狀況，並從歷史與（館臣）自我身分的關係，進行研究方法的思考與展望。

下午 15:40-16:40 第五場

由政治大學高桂惠教授主持，台師大李幸玲教授發表〈吉藏對《法華經》聲聞受記的詮釋〉、政治大學馮藝超教授發表〈清官難逃猾吏手—《杜騙新書》中的衙役故事探悉〉、張惠珍教授〈晚清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新石頭記》的大旅行與新中國想像〉三篇論文。吉藏以融合諸說的方式詮解《法華經》，李文除梳理吉藏對聲聞受記的義理脈絡外，亦討論吉藏在佛教史的地位。馮文則針對《杜騙新說》中的衙役故事進行分析；張惠珍教授則以清末《新中國未來記》、《新石頭記》為例，討論時人經過旅行經驗對新中國的想像。

二、與會心得

1、長崎大學、長崎中國學會所舉辦之國際學術會議，此次係為第二屆，以東亞漢學的回顧與展望為主題。該會未以單一論題為限，乃欲透過個人研究的分享方式，博通與對話其他學者之研究領域及方法，期望創造各種可能性。本人為該會會員，深感不同領域之對話，往往能擴大研究者的視域，並獲得新的啟發與刺激。

2、《四庫全書總目》在江戶時期已傳入日本，日本學者提供此方面諸多訊息，並建議合作《四庫全書總目》傳播日本之研究，其主題具有積極意義，值得發展。

3、此次與會者包括臺灣、大陸、日本等國學者，論文各具新意，且推證縝密，有助個人學思。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省略)

二十四日經長崎港赴伊王島，藉此了解長崎做為江戶鎖國時期通商港口之情況，並從伊王島上之天主堂得知近代異文化傳入日本的歷史。

二十五日赴長崎縣立大學，以「中國明清古籍流傳長崎的文化意義」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四、建議

將中國漢學放入東亞學術整體脈絡，進行反思與建構，已有若干學者與單位展開研究，並獲致可觀之成果。此研究路入為東亞文化進行了深度之回顧、思考與理解，實有助活化漢學研究，並有利東亞文化圈之未來發展，值得持續推動研究。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會議議程、與會發表學者之論文集兩冊。
2. 長崎縣立大學學報乙冊。

備註：本次會議為該三年期研究計畫第三次出席國際會議，會議時間、經費業已變更，並獲核准。

